



# 基督徒探索爱国之路的典范 ——容闳

文·徐晓鸿

近日翻阅一些史料，突然意识到今年是容闳先生（1828-1912）逝世100周年。目前，国内对这位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后世称之为“教育家、改革家、政治家、爱国者”<sup>1</sup>的知识分子却鲜有纪念性的文章，中国教会更不应忘记这位爱国爱教的基督徒，故冒昧撰文以期抛砖引玉，引起更多方家的兴趣。

容闳，字纯甫。清道光八年十月初六（1928年11月17日），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原属中山市，后划归珠海市南屏镇）。1835年，七岁的容闳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并于是年入读当时仍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之马礼逊纪念学校（Morrison School），由传教士郭实腊（Karl Gutzlaff, 1803-1851）之夫人负责教导。1839年中英关系恶化，郭夫人离开澳门，但容闳仍在马礼逊纪念学校中就读。同年，美国勃朗（Rev. Samuel Robbins Brown，生卒不详）牧师抵达澳门。1842年，由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故马礼逊纪念学校迁往香港，容闳亦随之迁往香港继续学业。1847年，勃朗牧师返回美国，离开时带着容闳、黄宽（1829-1878）及黄胜三人前往美国留学。其后只有容闳一人留在美国升学，黄胜因病返港，而黄宽则于1849年转读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容闳赴美后于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Monson Academy）就读，1850年毕业后考入耶鲁学院，为首位于耶鲁学院就读之中国人。诚如吴相湘先生所说：“容闳生平即一部中国近代史，身经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太平军、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以及洋务运动、维新运动、革命运动。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1822-1864）等及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张之洞

（1837-1909）、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李荷玛（Homer Lee）、孙逸仙（1866-1925）先生均有直接交往，为着救中国、强中国曾使用各种不同方案。”<sup>2</sup>

## 一、信仰虔诚的基督徒知识分子

关于容闳的基督教信仰，一度曾引起人们的争议。原因不外乎查不到他哪一年受洗入教，加上他拒绝做宣教士，以至于人们把他当作一个只不过借助教会平台，热心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然而随着海外研究容闳的深入，人们发现其实他的信仰是极其虔诚的。

容闳受洗的时间确实无法考证，他的自传里也没有提到，但耶鲁大学教堂在1851年6月1日的记录中，有关“容闳来信确认”（Yung Wing admitted on letter）<sup>3</sup>证明了他已受洗入教，他自认是公理会的信徒，地点在港澳或是孟松则没有说明。至于不愿做宣教士则与他实业报国的心态有关，他自己解释道：“而予对于此等条件，则不能轻诺，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sup>4</sup>他相信“上帝赋予人应尽的本分，不能因为受到限制而改变”。1854年毕业后，他读《提摩太前书》5章8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好像在催促着他，“亲属”和“自己家里的人”就是他深深眷恋的中国。不久以后，经过151天的海上漂泊，他终于回到香港。

归国后的容闳，虽不愿意做宣教士，但却经常参



1. 见李可柔、毕思乐：《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单传航、王文宗、刘红译。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22页。
2. 吴相湘：“容闳最有意义的一生”，载于《传记文学》，第60卷，第6期，第4页。
3. 同上，第5页。
4. 容闳：《西学东渐记》，台北：广文书局，1989年9月，第3版，第23页。



加教会举办的各种聚会，并与一些传教士以及基督徒科学家李善兰（1811-1882）、徐寿（1818-1884）等保持密切的关系。容闳自己回忆说：有一次，礼拜四晚上他参加上海苏州河边教堂祷告会回来，遇到西洋船公司的大副醉酒闹事，容闳毫不客气地训斥了美国人<sup>5</sup>，此事间接见证了他信仰生活的热忱。1860年11月，应美国传教士之邀，他从上海来到南京，拜访了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对太平天国的建设条陈七事，其中第六条指出：“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为主课。”后来，容闳担任清政府驻美副使期间，与玛丽·凯劳格（Mary L. Kellogg）结婚，1886年6月28日，容闳的美籍爱妻病故，留下两个儿子，大的九岁，小的七岁，忧伤之余，情绪亦低落至极，然而想到儿子，却很得安慰，他认为功在基督教教育养成的人格。为此他说：“吾二子皆能养志，品行亦佳，无忝耶教人格，此则予引以者。”<sup>6</sup>他的两个儿子后来不负所望，均从耶鲁大学毕业。

尽管容闳信仰虔诚，但头脑十分清楚，当初拒绝做宣教士，是抱着救国爱国的信念，当他看到外国传教士包庇诉讼，甚至酿成教案后非常痛心，因此，在请丁汝昌（1836-1895）代奏朝廷留学计划的时候，在第四项专门提出了“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侵入”的建议，容闳的这一建议源于天津教案的刺激，他的目的不是排斥教会，而是要改变教会在社会中的形象，为此他说道：“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是因仇教之恶果，而转得维新之善因，在中国国家未始非塞翁失马，因祸得福也。”<sup>7</sup>

首批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期间，一些学生剪去辮子，穿上西装，参加礼拜，甚至受洗成为基督徒，并且成立了“中国基督徒宣教会”，这些都成为赴美中国教育使团的罪状。然而客观地说，容闳等人的信仰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这些人。晚年的容闳，信仰更加坚定，在好友推切尔牧师（Rev. Joseph Hopkins Twichell，生卒不详）一家的帮助下，度过了美国排华法案下的艰难岁月。

## 二、西方学术灌输中国的理想者

容闳说：“予既然远涉重洋，身受文明教育，且以辛勤刻苦，幸遂予求学之志……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旦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sup>8</sup>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容闳报国、爱国的理想。

清末，朝廷软弱无能，官吏腐败成风，这一切使容闳深感痛心。他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益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sup>9</sup>

一心报国的容闳，一开始并未受到器重。对于科举制度下的取仕制度，容闳并不擅长。他曾尝试接触太平天国，并向洪仁玕条陈七事，洪秀全也曾授予他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结果被他拒绝。原因在于他看到了太平天国虽然有着拜上帝之形，却无他在西方了解到的基督教之实。

十九世纪60年代后，清廷的开明人士逐渐意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洋务运动登上历史舞台。1863年，正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曾国藩，得到张斯桂（1816-1888）、李善兰的举荐，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由此他被封为五品官员。在容闳的努力下，曾国藩、李鸿章采纳了他提出的选派留学生赴美的建议，1871年，请政府设立了“幼童出洋肄业局”（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也称中国教育使团）。得知计划被批准，容闳喜不自胜，“他兴奋地走来走去，心中默默地赞美上帝，从他返回中国算起，已逾十六载，上帝终于应允了他的祷告”<sup>10</sup>。

1872年，120名幼童分批前往美国留学。但随后之数载，驻美公使陈兰彬（1816-1894）不断地要求撤回



5. 见姜仁圭：《基督徒知识分子的爱国呐喊》，台北：基督教学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06年7月，第1版，第144页。  
6. 林治平：《QQQQ的人生——全人理念与现代化》，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8年2月，第133页。  
7.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4页。  
8. 姜仁圭：《基督徒知识分子的爱国呐喊》，第202页。  
9. 同上，第201页。  
10. 李可柔、毕思乐：《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第8页。



学生，与容闳争论不休，李鸿章从中调停。然而1881年，留学之事出现变数。李鸿章本欲该批学生进入军校就读，但美国政府当时只允许日本入就读军校，而拒该批学生于外，陈兰彬故主张全撤留学生。无奈下李鸿章本打算让学生们于美就读其他学校，速成回国，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误会其意而下全撤之令，因此“驻洋肄业局”被迫停办，留美学生先后四批，于出国十年后被迫返国。虽然这次留学活动未能圆满成功，但对此后学生留洋却有很大影响，其中不少留洋学生也成为后来各个领域的先驱人物。

### 三、举办洋务富国强兵的实践者

作为第一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高才生，容闳与当时的国人在视野上有着巨大的反差。这也是东西方文化在他内心激荡的一个心结，一方面要做最有益于中国的事；另一方面不得不迁就残酷现实。早日使中国富强起来，这一使命使他感到力不能胜，但又不能不为。

1856年8月，他曾上海海关翻译处谋职，当他发现海关通事与商人们勾结舞弊后，立即放弃月薪200两的高俸，申请辞职，同事和家人都不理解。而他却说：“予之操行差堪自信者，惟廉洁二字。无论何往，必保全名誉，永远不使玷污。”<sup>11</sup>“道德为重，金钱为轻”便是他处世为人的原则。

“洋务运动”的开展，终于使容闳觉得有了施展所学的平台，在江南制造局的创办中，他发奋工作，出色完成了任务，得到了曾国藩等人的赏识。容闳并不满足，他有一个更宏大的计划，就是派更多的人出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从而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最终于1871年促成了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容闳兴奋地说：“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sup>12</sup>留学计划中，学生进入美国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学习是不容忽略的一环，然而，1882年，美国的排华法案获得通过，因此，学生进入军校学习便没有了实现的可能。加之留学计划的“流产”，容闳再次陷入苦闷之中。

在外交上，他揭露了秘鲁和古巴诱骗中国苦力，遭受残酷折磨的事实，促使清政府不再允许往这两个国家派劳工。1873年，为了将格林式机枪引入中国，容闳专程从美国返回，他“一心为中国能拥有现代化的枪支和受过最现代教育的人才而焦虑”<sup>13</sup>。留美学生回国后，他为学生们的前途四处游说奔走。这时，李鸿章看到了

这些人才的潜力，逐步在各种洋务实业、矿山铁路以及新型军队中重用留洋学生。

为了报效国家，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容闳不断做着各种努力。1894年，中日甲午开战，容闳写信给张之洞建议向英国借款购铁甲船以袭击日本，张囑容赴伦敦商谈，后因李鸿章的反对而被迫停止。1896年，他又提出了设立国家银行的计划，中途遭到盛宣怀（1844-1916）的破坏，被迫中止计划。容闳后来又提出了修建天津至镇江的铁路计划，遭到了德国人的干涉而未果。看到鸦片烟的流毒，容闳上书呼吁在中国和印度铲除种植罂粟，也被清政府搁置一旁。

容闳满腔热情，却生不逢时，晚年的容闳再遭美国“排华法案”之害，被剥夺美国公民身份，但他的爱国热情丝毫没有减退。1909年，他终于盼来了中美达成的协议。美国将部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到美国留学的学生身上。他在哈特福德召开的中国学生同盟年会上，鼓励学生：“要立志将中国建成领先强国，来改变世界的命运。”<sup>14</sup>

### 四、寻找改良与革命的探索者

经历了一系列挫折的容闳不得不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外强环伺，清政府内部却腐败不堪，屡战屡败，屡败屡辱。尤其是甲午战争惨败和《马关条约》签订，让他意识到，非寻求改变不可。他悲愤地说：“予之种种政策，既皆无效，于是予救助中国之心，遂亦至此而止矣。”<sup>15</sup>

1898年8月，容闳结识了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并一同进京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他为此著文倡导变法改良中国社会，康、梁等也常以容闳居所为讨论场所<sup>16</sup>。百日维新的短命迫使康有为仓皇出逃，容闳与李提摩太设法营救了梁启超。在获知自己已在清政府通缉名单中后，容闳又逃到香港。1900年3月，容闳来到新加坡。此时，康有为正秘密隐居在新加坡爱国华商丘菽园（1874-1941）的寓所：汤申路恒春园的南华楼里策划庚子勤王起义。容闳此次来新加坡，是康有为要借重容闳的声望，邀约容闳与在檀香山的梁启超一起赴美筹措巨款，用于支持庚子勤王起义。康有为等人赋诗记录了此次聚会，诗中写道：“德星光怪聚星坡，中外歌诗慷慨多。合沓蛟龙会云气，共伤故国起山河。”<sup>17</sup>

容闳回到上海租界后，在那里成立了“中国强学

会”，该学会以讨论维新事业及一切重要问题为宗旨，容闳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容闳在纪传体回忆录《西学东渐记》里有明确记载：“即在上海组织一会，名曰中国强学会（即中国国会），以讨论关于维新事业及一切重要问题为宗旨，予竟被选为第一任会长。”根据日本东亚同文会驻上海支部干事井上雅二（生卒不详）1900年7月26日的日记：“汪康年（1860-1911）、唐才常（1867-1900）等一个月以前提出的所谓国会，今天终于在愚园召开了。出席者五十二人，均为民间人士。前驻美公使容闳为主席，严复为副主席，决定二十九日再次开会，但章程尚未制定。”<sup>18</sup>

容闳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在于他对光绪皇帝的推崇，他曾说：“光绪亲政后，颇思革新庶政，其一种励精图治之决心，足使京内外人士注意，如北斗之见于天空，人人咸为引领。”“后人之读清史者，必将许其为爱国之君，且为爱国之维新党。其聪明睿智，洞悉治理，实为中国自古迄今未有之贤主也。天之诞生光绪于中国，意特命之为中国革新之先导，故其举措异常人，洵伟人也。”<sup>19</sup>当然冀望一个被囚瀛台的君主，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1900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皇西逃，东南互保章程签订，庚子勤王运动惨遭镇压。容闳在香港期间，秘密会见兴中会早期领袖谢瓚泰（1871-1937）、杨衢云（1861-1901）等，这次与革命党人的接触，增加了他的忧国之心。庚子勤王被张之洞镇压，唐才常等20多人遭到逮捕杀害，革命党人容星桥（1865-1933）因得到容闳的庇护而逃脱。1900年9月，容闳在日本与孙中山、容星桥会面，双方终因政治态度不同而没有达成一致。容闳虽然对孙中山的主张不全赞成，但还是留有一定的印象。据刘成禺（1876-1953）撰写的《世载堂杂忆》中“纪先师容纯父先生”的一段议论：“孙逸仙自伦敦释回，访予谈数日，予亦

以此义告之。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予勖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心志。他日见面，汝当助其成功。”<sup>20</sup>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他对孙中山的好感。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把更多精力用来对付革命党，对改良派康、梁反倒有所放松。容闳后来在给经元善（1840-1903）的信中表达了对清政府新派和旧派的失望，他说：“间尝论中国之大患，固不在于喜新，亦不在于守旧，独患其不新不旧，可新可旧。非但新旧相攻，抑且新旧自攻。积弱不振之原因实由此辈乡愚，行同鬼域所酿成，遂有如今之一日也，悲夫！仆与公异流同源，故不禁忧愤交加，忘其言之急烈。”他感叹：“仆本庸才，齿逾古稀，致君乏术，救民无权，惟留此一腔热血漾胸。”<sup>21</sup>此后，他便定居美国。

1909年发生的康有为保皇党刺杀维新志士刘士骥（1857-1909）一案，使容闳彻底与康有为决裂，转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并将他在美国结识的同情中国革命的金融界人士布司、艾伦和军事理论家荷马·李介绍给孙中山先生。孙中山与荷马·李、布司等密谋的长堤计划，被称为“中国红龙计划”，可以说是容闳竭力促成的结果，尽管这一计划最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但它却是容闳为革命党所做的重要贡献。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响应，孙中山回国被推为“临时大总统”，容闳对中华民国心向往之。孙中山特向容闳致函：“民国建设，在在需才！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倘俯允所请，则他日吾人得享平等自由之幸福，悉先生所赐矣！”<sup>22</sup>孙中山请辞恳切，对容闳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1912年4月22日，未完成归国梦的容闳病死于美国哈特富特镇。

容闳的一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浓缩，更是仁人志士探索民富国强的高度概括。容闳逝世100年，他的救国报国爱国精神永远长存！谨著此文，以斯纪念。

（作者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秘书长）

11.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页。

12. 同上，第104页。

13. 李可柔、毕思乐：《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第10页。

14. 同上，第22页。

15. 姜仁圭：《基督徒知识分子的爱国呐喊》，第204页。

16. 同上，第46页。

17. 见康有为：《容纯甫观察、丘仙根总统、王晚沧广文来星坡，与林文庆议并集南华楼，林君赠我西文诗，即席答之，并索邱王二子和作》，容纯甫即容闳，清时对做过道员的官员称观察；邱仙根即丘逢甲（1868-1912），清末著名诗人，因抗拒倭寇割让台湾，曾担任“台湾民主国”副总统，故称；王晚沧（生卒不详）是清末爱国诗人；林文清（1869-1957），著名爱国华侨，曾任新加坡立法院议员，笔者注。

18. 杜迈之等编：《自立会史料》，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366页。

19. 刘玉全：《容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转变辨析》，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7ece0e7c0100vtgv.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7ece0e7c0100vtgv.html)。

20. 容应黄：《容星桥：容闳与孙中山的连接点》，载于吴文英等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714页。

21. 度和平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4月，第1版，第376页。

22. 姜仁圭：《基督徒知识分子的爱国呐喊》，第47页。